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

(一)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

(一)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 编

文 物 出 版 社

书名题字：于省吾
封面设计：仇德虎
摄影：王 露
责任编辑：张圣福
张国生

河 南 出 土 商 周 青 铜 器

(一)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部 编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1068·860 定价：27元

前 言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境内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其中仅商周青铜器一项，就多达一千余件。

在历史上，河南地区曾多次发现重要的商周青铜器，如安阳殷墟、浚县辛村、洛阳马坡和新郑等地出土的，或有长篇铭文，或有特殊艺术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建国后新出土的一千多件器物，商代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郑州、辉县和安阳殷墟等地，西周青铜器多出土于洛阳、鹤壁、上蔡等地，春秋战国的出土地点更为广泛，新郑、潢川、上蔡、三门峡、郟县、桐柏、新野、淅川、信阳、固始、辉县等地均有发现。这些青铜器绝大部分是从商周墓葬或窖藏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其科学价值远胜于过去的传世品。

商周青铜器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我省三十年来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化艺术成就，为研究商周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些青铜器，有不少曾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也有一部分尚未报道。为了给科学研究工作提供较为系统完整的资

料，现将我省解放以来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按照时代分地区汇编为三册，陆续出版。

第一册 商代

第二册 西周、春秋

第三册 战国

第一册有《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概述》论文一篇，介绍本册所收商代器物的发现、分期以及铸铜遗址等问题。第二册有《河南出土两周青铜器概述》论文一篇，对第二、三两册所录西周、春秋和战国的器物的发现、国别等有关问题作概括的介绍。每件器物均有简要的说明，记载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花纹、铭文及造型特点。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三门峡市文化馆、灵宝县文化馆、新郑县文化馆、潢川县文化馆、密县文化馆、桐柏县文化馆，以及其他有关市、县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一九八一年三月

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概述

贾 峨 杨育彬

河南地处祖国的中原，太行山脉蜿蜒于西北，大别山脉逶迤于东南，西部的伏牛山脉与秦岭相接，黄河与淮水横贯其间。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

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它和黄河流域的其他几个省区，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劳动生息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地区开始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公元前十六世纪建立的商王朝，把我国古代社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迄今为止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商代文化所分布的范围，西达现在的山西、陕西，南抵江西，北至辽宁，东及渤海湾西岸和山东半岛。而河南正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心。代表商代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安阳殷墟三大遗址，也都在河南境内。因此，对河南的商代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研究，是我们探讨和了解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

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最早著录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其后许多书籍也载有不少器物的图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偃师二里头，郑州白家庄、铭功路，安阳殷墟和辉县琉璃阁、褚邱等地都有成批重要的青铜器出土。此外，在密县曲梁，登封告成、袁桥，荥阳西张、张片庄，中牟黄店，新郑贾庄、望京楼，偃师塔庄，项城毛冢，获嘉照镜、东张居，孟县涧溪，林县下庄和洛阳西关等地，也有所发现。

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代城内的宫殿建筑群遗址的发现，是我国奴隶制时代考古学的重大收获。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的宫殿建筑遗迹和郑州商代城内的宫殿建筑群遗迹，表明这里曾是商代前期的两处重要都邑。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这三处遗址都有大批青铜器出土，我们对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不妨以此为线索，划分为偃师二里头期（简称二里头期）、郑州二里岗期（简称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三段加以考察。

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生产工具，有戈、戚、铍、凿、锥、刀、镞和鱼钩等。这些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都模仿同形制的石器或骨器，具有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特征。例如直内戈的援与内的分界不明显，曲内戈的援与内

交接处呈直角，无阑。簋、鬲的顶端无釜，不能安装木柄。出土的容器只有爵，且数量很少。一般细腰平底，铸造较粗糙，器壁极薄；口沿前有窄流，后有尖长尾，流口间有短柱或无柱，口沿边略加厚；爵身横剖面呈桃形；带釜一侧近流处的口沿微向内凹；一足与釜相对应，另两足分别与流和尾的部位相对应；足较矮，且长度不一。也有的爵，两足呈三棱形，一足呈四棱形，外侧错出器身。从流口和尾尖到底部，以及底部、三足都留有范痕。一般的爵装饰简朴，素面无纹饰，有的釜上有镂孔。还有一种爵，细长的流尾，从流端到尾端的长度几乎与爵的通高相等，流口间有小柱。三棱锥足外撇，且是另行铸造后再与身嵌接在一起的。爵身一侧有两道弦纹和一排乳钉，这是我国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釜上有镂孔，是填塞范芯时上定位销遗留的痕迹，它显然是模仿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文化层陶盂或陶爵器釜的镂孔装饰。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另一特征，是出现了镶嵌装饰。1975年秋，在遗址3号坑出土的铜戚和铜戈的近旁，发现散置着细小规整的片状绿松石，估计是铜戈曲内云纹间的凹槽中镶嵌用的。在4号坑出土的一件圆形铜器，直径17、厚0.5厘米，边沿镶嵌了六十一块长方形绿松石，有如钟表盘面的刻度，中间镶成两周，每周由十三个“十”字形绿松石构成，相当精致。这都说明了二里头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脱离了原始阶段。

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郑州白家庄、铭功路和河南其他地区二里岗期墓葬，出土了约一百五十件青铜器。它们的年代虽晚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但从器形和纹饰的风格特征加以考察，一般都要早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和江西清江吴城三处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二里岗期最常见的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有：斧、钺、斨、戈、矛、镞、刀、锥、钻和鱼钩等。它们的形制多仿石器和骨器，但已有明显的变化和改进。例如：斧、钺、斨、矛的顶端有釜眼，用以纳柄；镞有两翼和血槽；戈的援内有凸起的阑，以防戈头脱秘。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青铜容器有：鼎、鬲、甗、爵、盃、觚、尊、罍和盘等。它们的形制虽还未脱离陶器的窠臼，但纹饰却有了自己的特点，比起陶器表面极简单的拍印纹饰，要复杂多了，出现了饕餮纹。二里岗期下层墓葬出土的铜器，鼎、鬲的口沿上都有半环状耳，两耳和三个尖锥状空足，排列的部位和同期出土的深腹陶鼎相同，即一耳在两足间的空档，另一耳与另一足相对应；一些鼎的颈腹间饰两周弦纹；鬲的腹部与分裆间的外壁饰两周凸起的人字纹；敞口甗的形制和二里岗期下层陶甗相似，但在颈下铸两周弦纹，弦纹之间铸一周凸起的乳钉；盃的器形极似二里头第二期的陶盃；爵窄流，两柱矮小，靠近流部。三足支点不很稳定，椭圆形的平底上有“人”形的范线与三锥足相连，腰较二里头期的铜爵略粗，口沿保持着略加厚的特点。有的腹部铸两周弦纹和一周乳钉纹，如同二里头期铜爵上所铸的纹饰。在二里岗期下层出土的青铜器上，还可以看到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兽面纹。登封袁桥、中牟黄店和郑州东关出土的爵，兽面纹的双目是空白的，形象很简单，

并且各不相同，说明这种纹饰尚未定型。二里岗期上层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较下层数量增多，器类也有不同。有的爵，器身瘦长，上腹较细，下腹圆鼓，腹壁间饰两层饕餮纹，流口间有独柱或较高的双柱。新郑望京楼出土的圆鼎，深腹空足，两耳和三足的位置与下层的鼎相同，但出现子母口沿，可以承盖。郑州张砦南街出土的方鼎，口沿的长宽比例相近，四足空心。斚的器形虽与下层的相近，但双柱的顶端已作菌状，且饰涡纹。尊、罍、盘的圈足较矮，并有镂孔。觚体较矮，作筒状。二里岗期上层墓葬时有下层类型的铜器出土，如属二里岗期下层的郑州黄河医院32号墓出土的爵和斚，在二里岗期上层墓葬内也可见到，这可能是铜器本身的使用寿命较长的缘故。二里岗期上层青铜器的纹饰已经趋向成熟。鼎、鬲、爵、斚、盃、觚、罍和尊，大都采用单层花的流动云纹和带状饕餮纹作装饰的主题，但偶然也可见到目雷纹、三角雷纹和弦纹。在布局上，这些纹饰多安排在器物的颈部、肩部、上腹部或圈足的外壁。环绕于爵、觚外壁的，通常是两组，在鼎、鬲、盃、斚、罍、尊、盘外壁的多系三组。这时期的纹饰，也并非单一的，还有由单线条或双线条组成的饕餮纹，双目凸出器表，线条间的空隙较大，似是后世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来的。这在郑州白家庄和辉县琉璃阁出土的一些铜器中，最为典型。此外，也有用单线条组成的目雷纹和联珠纹，以及云雷纹、圆涡纹和十字镂孔等装饰。二里岗期上层个别青铜器的纹饰，有由带状分布转向通体开展的趋势，如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尊、罍，偃师塔庄和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尊，郑州杨庄、辉县琉璃阁和郑州铭功路4号墓出土的爵，荥阳张片庄出土的斚等就是如此。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郑州白家庄出土的罍，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唐兰释为“𪚩”字），肩部饰云雷纹，腹部饰较大饕餮纹及云雷纹，主纹上增添了细线，上下缘以雷纹作边饰，圈足上饰弦纹和十字镂孔。这种装饰打破了以往用饕餮纹作带状的习惯，腹部主纹上的细线，预示着即将出现主纹衬以地纹的新形式。1954年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尊，腹部饰饕餮纹，肩部有凸出的兽头和扉棱，由于器物表面纹饰层次的增多，加强了器物的立体感。这在商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上，应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

殷墟期出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远较二里岗期增多，器类也较复杂。常见的兵器有：戈、矛、戣、钺、戚、刀、镞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斨、钁、铤、凿、锥和铲等。还出现了大批通体饰有花纹的礼器，如：鼎、斚、鬲、爵、盃、觚、罍、尊、甗、觶、盘、簋、壶、卣、甗、角、觥、觥、方鼎和方彝等。许多新器形的出现，说明在商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铸铜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

考虑到殷墟期包括的年代较长，为便于说明，我们把它划分为四期，分别加以叙述。

殷墟一期的青铜器，解放前在殷墟出土不多，解放后也很少发现。密县曲梁遗址出土的觚，器形与二里岗期上层相近，但圈足饰饕餮纹，改变了以前只在腰部饰饕餮纹的格局。灵宝东桥墓葬出土的鬲、爵、斚、尊、甗、钺、斨，明显地具有此期的特征。鬲

的器形虽与二里岗期的相似，但器壁已明显增厚，锥足的足根已较二里岗期的平整，有向柱足发展的趋势；斚颈部饰目雷纹，足的横断面作“T”形；爵柱已退至流口间，腹的横断面趋向扁圆，浅圜底与腹壁间有明显的分界线，中腹外壁一侧饰以雷纹地的饕餮纹；甗的器形和纹饰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相似；尊器壁较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厚重。如上特征都表明，这些器物的年代稍晚于二里岗期上层，与殷墟一期接近或相当。根据这个论断，我们认为殷墟一期似可列入商代前期的范畴。

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和武官村大墓为代表的殷墟二期，出现了新的器类和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甗、缶、偶方彝、方彝、方罍、方壶、方尊、透雕觚、圈足觥、四足觥和鸮尊，还有五枚成编的铙以及镜、卷云纹铲、箕形器、多钩形器和斗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器壁较以往厚重，“三层花”装饰已相当普遍。有些器形已经大型化，甚至发展成联体的形式。有的模拟动物的形象，有的还增加了器盖。方鼎长与宽的差距较大；圆鼎都是深腹柱足，两耳与两足对应，改变了二里岗期的形制。妇好墓出土的龙首刀、釜内戈和弓形器，可能与当时战车的装备有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提梁卣、分裆柱足鬲、带扉棱的爵、三角形的戣以及1931年春殷墟331号墓出土的卣和提梁方卣都是这期的代表作。这期的礼器多成双成套。平底爵数量减少，圜底爵盛行，平底斚的三足外撇，甗腹较深，圈足器的圈足较高。礼器的纹饰可分立体和平面两种，立体纹饰有龙、夔龙、双头盘龙、虺、人头、虎头、牛头、羊头、鸮、鸟、鹰头和其他怪兽。平面纹饰以饕餮纹为主，也有虎面纹、夔纹、蝉纹、蚕纹、蕉叶纹、对角雷纹、云雷纹、圆涡纹、龙纹、凤纹、象纹、鱼纹和龟纹等。这些铜器有铭文的不多，即使有铭文字数也少。铭文的图画和象形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有的器物还铸有族徽。

殷墟三期以1957年发掘的安阳高楼庄8号墓、1958年发掘的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和罗山蟒张1号墓为代表。前两座墓葬都是小型的，出土的青铜器虽不如王室墓葬，但在器形、纹饰和组合方面都具有特点，可看作这期铜器的典型作品。这两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类及组合情况如下表：

安阳高楼庄 8 号墓和大司空村51号墓出土青铜器对照表

墓 别	器 名 数 量																		
		鼎	爵	斚	卣	壶	簋	尊	觚	觥	戈	矛	刀	削	弓形器	铙	铃	钺	镞
高 楼 庄 8 号 墓		3	2	1	1	1	1	0	2	1	8	3	1	2	0	3	4	2	0
大司空村 51号墓		2	2	0	2	0	1	1	2	0	6	5	1	1	1	3	2	2	1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两座墓出土的青铜器类和数量都很接近，前者比后者多一鼎，卣、壶、尊等互有差异，戈、矛、镞、削、刀、镗和弓形器等随葬的成套兵器和工具的类别和数量也很近似。这说明了两座墓的墓主的身份是相似的。两座墓出土的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与大司空村车马坑出土的战车所附属的兵器和工具几乎完全相同，表明它们的主人也属于武士阶层。这期的器物特征是：甗腹较殷墟二期的浅；簋敞口，下腹斜收，器形与同期陶簋相近；圆底爵和罐形斝盛行；尊的器形似殷墟二期的细体觚；细体觚的器形更为细长；壶器身横断面呈扁圆形；甗形卣有提梁；弓形器多星形装饰。这期器物还流行尾部下卷的饕餮纹，三角纹、三角雷纹、菱形乳钉纹和小型兽面纹很普遍，夔的唇口多反卷，鸛纹、蕉叶纹和“三层花”也较常见。1976年殷墟祭祀坑229号墓出土的约为祖庚、祖甲或廩辛时期的两件大小铜鼎，与1939年殷墟出土的文丁时期的著名“司母戊”鼎，都是这期的代表作。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都较精致美观，气魄雄伟，标志着商代青铜冶铸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59年发掘的安阳后岗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是殷墟四期的代表。这里经过两次发掘，出土鼎、卣、爵、刀、镞各一件，戈两件。此外，还发现了三十余件殷代晚期的陶器。出土的鼎有铭文三十字，是商代铜器中铭文字数较多的一件。鼎贯耳外侈，上腹饰带状饕餮纹，且有扉棱，柱足上下较中部粗，上段饰兽面并起扉棱，足根似蹄形，与西周初期的大孟鼎器形相似。甗形卣没有提梁，肩饰小型兽面，器形和殷墟三期的接近。镞的双翼作燕尾状，中间起脊，有短铤。环首刀系直背直刃。所有这些，都属于殷代晚期铜器的特征。出土的戈中，有一件的冒，原应钉在秘端，却被装饰在援、内间的上部；另一件，长胡两穿。类似的戈，在西周的墓葬中也曾见到。殷墟四期的簋、盂，圈足较高，普遍有双耳；盆形鼎、分裆鬲和甗的腹部相对变浅；爵的双柱较长，退至口的前沿；斝分裆，菌状柱较高；盂作壶形；粗体觚为平底，高圈足内壁偶尔有铭文；细体觚有扉棱。在纹饰方面的变化，主要是饕餮纹的尾部下垂，夔纹口部作上下对称的钩状。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河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此外，还有一种素面无纹饰的或纹饰极为简单的器物，例如仅有弦纹的鼎、鬲、爵和斝，或仅饰“×”、“≡”纹的鼎和鬲，乳钉纹的爵和斝，以及腹部饰有椭圆形鼓面纹的斝等等。这些风格简朴，保持着陶器特点的青铜器，从商代早期到晚期与铸有饕餮纹等较复杂纹饰的青铜器始终并存着。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意。在五十年代，有人曾认为，它们可能属于明器。我们以为这个论断似难成立。据我们推测，这种青铜器并非明器。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与当时使用这一类型器物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

二

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一带就曾出土过带有铜锈的陶范、炼渣、木炭、

熔铸的铜块、锡块，还发现过重达18.8公斤的孔雀石、粘有炼渣的“将军盔”残片、重达21.8公斤的炼渣以及铜壶和铜方彝的泥模残片。但是这些发现都较为零散。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境内商代铸铜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商代青铜器和铸铜手工业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953年，在洛阳东郊泰山庙发现一处商代铸铜遗址，出土有大量铸铜的碎片，其中云雷纹的觚范极为精细。1954年，发掘了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出土了圜埴、灰陶大口尊、红陶缸等熔铜工具和镞、双刀、斚、方鼎、鬲及爵等铜器的陶范和范芯，以及孔雀石、铜渣、木炭和一些青铜器。1955至1956年，在郑州紫荆山北地商代铸铜遗址，发现了房基和地坪上布满了绿锈的铸铜场地。1959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了圜埴残片、铜渣和陶范，说明这里有商代早期的铸铜遗址。1960年，调查了武陟县城东的商村铸铜遗址，在商代文化层中发现了陶制的饕范和铜渣。1959至1960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包括薛家庄一带）和孝民屯，发现一处约一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经过发掘，在苗圃北地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单间和双间房基、工棚遗迹和圜埴，还有铸造鼎、爵、觶、觚、卣、盘、器盖、簋、鬲、镞、矛和铜泡等使用的外范3835块，铸造觶、觚、斚、爵、鼎、簋、戈、矛等使用的内范1003块，以及少量的陶模残片。长达1.2米的方形陶范、直径0.83米的圜埴、直径1米的炼炉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里是一处规模相当大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具有冶铸大型青铜器的能力，当是无疑的。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商代在通都大邑，都设有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以殷墟宗庙宫室遗址附近的规模最大。

在郑州和安阳的商代铸铜遗址，我们发现当时用于冶炼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冶炼的温度估计在1000℃左右。对两地出土青铜器进行化验，可知当时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锡和铅等元素。在冶铜器具方面，郑州两处铸铜遗址出土的红陶缸、灰陶大口尊，安阳殷墟出土的“将军盔”，都是夹砂厚胎陶器，外壁抹有耐火土，用以增强其强度和耐热保温性能。规格均较小，灰陶大口尊口径36.8、壁厚2、残高55.4厘米；红陶缸大小与此近似；“将军盔”口径25、壁厚3、高35厘米。看来它们只适宜铸造一些小型器物。前面提到的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出土的直径1米的炼炉，内壁有一层烧熔的渣釉，表面粘有木炭末和铜渣。在相当于炉座部位的周围，有许多炼炉残壁和木炭粒，硬土面上还遗留着几道有一定流向的凹槽，表面粘有铜渣，估计是流铜液的渠道。有一炼炉的残块，在炉壁与底部间有直径约5厘米的小孔，从由内向外的烧流遗迹看来，可能是出铜液的炉眼。炉内铜液从炉眼流出，经过渠道，输送到铸范浇铸。在同一处遗址里，还发现一种在地面下的土坑式的炉子，直径1、深0.5—1米，内壁已经烧熔，也粘有铜渣和木炭。这两种炉子看来是与当时大型铜器的冶铸规模相适应的。殷墟出土的著名的牛鼎、鹿鼎、“司母戊”鼎表明了这点。商代青铜器的铸造采用

的是陶范法。安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三棱形铜棒（一端尖锐如锥，一端扁平有刃）和一些骨制锥形器，当是刻划范模花纹用的。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有一次可铸造两把刀的刀范和一次铸造七枚箭镞的镞范，表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多腔型的范铸法。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出土的长达1.2米的方形陶范，是用泥条层层垒筑成的，当时的铸铜工匠已掌握了制作这样大型陶范的复杂技术，是毫无疑问的。从郑州张砦南街出土的两件大方鼎，以及郑州铸铜遗址出土的和上述大方鼎器形和纹饰相似的泥范看来，郑州二里岗期的工匠，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就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我们还从郑州和安阳等地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陶范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烘烤，进行预热处理。这样处理后的陶范，具有一定的强度、透气性和耐热性，浇铸时可承受铜液的压力，避免产生大量水蒸气，造成废品。在上述的铸铜遗址中见到的呈浅红色的陶范，就是经过预热处理的。

三

自从1898年发现殷墟遗址以来，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这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河南境内，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国内外学者对这些青铜器的标型、名称、纹饰、铭文和铸造工艺等，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但是，在旧中国，往往由于器物的出土情况不明，或者发掘方法不够科学，地层关系不清楚，使研究工作受到了一定限制。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商代文化的田野考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我们认为，关于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确立了二里头期、二里岗期和殷墟期的先后顺序。考古工作者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辉县琉璃阁等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地层关系上搞清楚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文化，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又早于殷墟代表的商文化。这一顺序的确定，使我们认识了早于殷墟期的青铜器，从而改变了商代青铜器只限于殷墟期即商代晚期的观念。象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种商代早期青铜器，在过去青铜器著录中是罕见的，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比较简陋原始，不为当时收藏家重视的缘故。二里岗期的一些器物虽见于某些著录，但以前也不可能正确判断它们的年代。对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青铜器的认识，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二，提出了我国青铜文化起源的线索。二里头期青铜器固然朴素简陋一些，但已有比较复杂的形制和器类，有相当成熟的范铸法和嵌绿松石等工艺。由此可以推想，在制造出这类青铜器之前，青铜器的冶铸已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从河南的考古工作看，铜器并不是到了商代才开始出现的。在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的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分别发现过铜刀和铜块。由此可见，河南地区冶铸青铜器的历史应上溯到商代以

前。商代青铜器冶铸技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古代传说中夏族活动频繁的豫西和晋南地区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对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虽然至今并没有完全探明夏文化的确凿证据，对一些大型的重要遗址，如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商代早期都城——西亳的问题，也还有争论。但此处遗址的一、二期文化层属于夏文化的历史范畴，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此处遗址一、二期文化层虽没有出土青铜器，但由于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铜刀和铜块，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它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在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找到若干片断记载。如《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乙卜于目若之龟，龟曰：鼎成，三（《玉海》三作四）足而方……”。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夏时可能已有铜器。探索夏文化的内涵，对我们深入研究商代青铜器和商文化的渊源，将有很大帮助。

第三，对殷墟期青铜器作出分期。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遗址地层的发掘、陶器的排队和分期的探讨，以及新出土甲骨的考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对于全面考察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分期和系统研究整个商代青铜器有很大的帮助。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商代青铜器承袭了龙山文化鼎、鬲、杯、盘等陶器的造型和艺术特点。作为重要祭器和生活用具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可能承袭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饮酒的习俗。铜鼎、铜鬲等三足器和铜戈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器具，它们以及其他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商代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有很大的进步，而且种类很多，分工颇细。从商代本身来说，以各期的青铜器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前期青铜器的器形一般较小，说明当时的铸铜手工业还不太发达，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到了后期，也就是殷墟期，铸铜手工业得到发展，分工更细，生产规模也有相当的扩大。这时，不论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精美程度都超过了前期，出现了许多气魄雄伟的大型作品。根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的考证，商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的一段时间，政治局面比较动乱，王都多次迁徙，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盘庚迁殷之后，政治局面渐趋稳定，政权得到巩固，生产力也得到提高。特别是高宗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达到商代后期的极盛阶段。相当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也较之前代有明显的变化。殷墟出土的大体属于或略晚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形较大，制作精美。如侯家庄西北岗1001大墓所出器物，就非常精致。上面谈到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成批的“妇好”铭青铜器，学者多认为是武丁时期的妇好所有，器类繁多，纹饰华丽美观。同出的很多玉石器，也十分精美。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武丁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

青铜器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青铜器体现了我国古代铸铜技术的高度成就，是当时手工业工匠以及整个奴隶阶级的智慧的结晶。虽然其造型和纹饰不可避免

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作为古代社会的艺术遗产，归根结蒂是人民的杰出创造，是几千年前人类辛勤劳动的光辉成果。它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叹。

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卜辞一样，是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珍贵材料。商代文字，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有体系的文字。虽然有很多学者殚心研讨，但仍有许多疑难问题有待解答。我们应当在不断发现新材料的过程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把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以期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编 例

一、本书选录河南省解放后出土的从商代至战国的青铜器，是一部科学资料性图集。

二、本书按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分地区编排。选录的标准为：1、解放后出土的；2、在分期上有代表性的；3、有铭文或造型、纹饰较好的；4、虽无铭文，造型和纹饰也较一般，但与上述器物成组出土，为保持出土时的器物组合，也酌予收录。

三、本书为了资料的准确和完整，不论器物过去发表与否，这次都重新加以蒐集和整理。

四、本书分三册：第一册为商代青铜器；第二册为西周、春秋青铜器；第三册为战国青铜器，以及附录、补遗等。

五、本书所录铭文拓片，一般按原大制版。少数拓片因版面限制必须缩小者，则注明比例。

六、器、盖铭文完全相同者，只选录其中一件。同类器物而铭文又完全相同者，只在首次出现时附释文，其余从略；如铭文内容相同，但行款或个别文字歧异者，仍附释文。

七、解放后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和资料，编成参考资料，附于各分册之后，以备查考。

目 录

前 言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概述	贾 峨 杨育彬
编 例	

图 版

彩色图版

一 乳钉纹爵	商代前期	1
二 夔纹鬲	商代前期	3
三 饕餮纹尊	商代前期	5
四 妇好方鼎	商代后期	7
五 偶方彝	商代后期	9
六 鸮 尊	商代后期	11
七 司母辛觥	商代后期	13
八 徙 卣	商代后期	15

单色图版

一 素面爵	17
二 素面爵	18
三 戚	18
四 云纹戈、戈	18

五	素面爵	19
六	饕、蚩	19
七	素面爵	20
八	铃	20
九	乳钉纹爵	21
一〇	素面爵	22
一一	素面爵	22
一二	弦纹罍	23
一三	饕餮纹爵	24
一四	弦纹爵	24
一五	饕餮纹觚	25
一六	戈	25
一七	弦纹爵	26
一八	乳钉纹爵	26
一九	戈	27
二〇	饕餮纹鼎	27
二一	饕餮纹罍	28
二二	饕餮纹爵	29
二三	饕餮纹鬯	30
二四	夔纹盘	31
二五	饕餮纹鼎	32
二六	夔纹鬯	33
二七	夔纹鬯	33
二八	乳钉纹罍	34
二九	夔纹罍	35